

簡報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2016 年第 6 期（总第 43 期）



2016 年 12 月 20 日

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宋代刑部建制述论》一文概述

2016 年 9 月 15 日龚延明教授于《河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教育部名栏”发表《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一文。

制度史研究有两翼，一翼是固定的、静态的成文法律制度史研究，这是传统的，也是基本的、基础的研究方法；一翼是“活”的、动态的制度史研究，这是新兴的、制度运作的史学研究方法，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关于“活”的制度史动态研究，笔者已发表过一篇《唐宋官、职分与合》（刊《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对唐宋长达 430 年的官、职离而后合的制度演变史，进行了动态的考察。本篇《宋代刑部建制论述》，是笔者用静态方法对宋代尚书省刑部及其所属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四司的设置沿革、编制、职掌及其在两宋的变化与刑政制度内涵，予以较详尽论述。这是法定的宋代刑部官僚机构，要了解宋代刑政管理制度，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研究，就不可能对宋代刑政制度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包括对宋代刑政制度的动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讞、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

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学术活动

关长龙教授参加“纪念沈文倬先生百年诞辰暨东亚礼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10月15-17日，在杭州参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中华礼学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沈文倬先生百年诞辰暨东亚礼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报应与惩罚：传统礼仪流行的“护法”维度》。



关长龙教授参加浙江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路桥区《乡村十礼》论证会

2016年10月14日，参加浙江省委宣传部在杭州市召开的路桥区《乡村十礼》论证会，来自省社科院、文化艺术、高校系统的十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乡村十礼》是台州市路桥区为配合省委宣传部“文化礼堂”建设而因地制宜创作的新时期乡村礼仪体系，包括周岁礼、启蒙礼、成人礼、新婚礼、重阳敬老礼、迎新祈福礼、清明崇先礼、尊宪守法礼、村干部就职礼、新兵入伍壮行礼等十大礼仪。本人还应邀就“迎新祈福礼”作了特别点评。



孔令宏教授参加第六届长三角地区道教论坛

2016年12月5-7日，第六届长三角地区道教论坛在杭州举办，200余名嘉宾参加了此次活动，教界和学界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论坛的主题是“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孔令宏教授提交了《东方道藏科仪类书籍分类方法探析》一文，从概念系统的角度对构建现代道教教义体系发表了见解，引发热烈讨论。



孔令宏教授参加首届金华山文化高峰论坛

2016年12月9-11日，首届金华山文化高峰论坛于浙江金华举办。此次论坛，以“金华山的时代责任与黄大仙文化世界传播”为主题，来自北京、山东、河南、广东、

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就积淀在金华山的历史与文化，以及重构“江东名山”文化体系，弘扬“人文圣山、侨仙祖庭、名山联谊”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研讨，并推出了金华山有史以来第一份《金华山共识》。孔令宏教授提交《黄大仙——论济世型神仙的现代意义》一文，并作为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



孔令宏教授参加中国云南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15-18 日，中国云南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昆明举办。本次研讨会旨在弘扬道教和平共荣、重道贵生精神，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和文化上的互动。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道教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道教在云南的历史传承”、“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等专题展开高水平研讨，孔令宏教授提交《云南十八寨丧葬仪式调查研究》一文，就云南特殊的丧葬文化进行了探讨。



周佳老师参加日本“宋代史谈话会”

2016年10月29日，由日本宋史学会会长平田茂树教授主持的“宋代史谈话会”在大阪市立大学举行。宋学研究中心的周佳老师应邀在会上介绍了由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项目及其成果，同时，提交了题为《从〈宋代登科总录〉数据看宗室科举政策变化》论文。本次学术汇报内容，得到与会的日本宋史学界老师们的一致关注，相关讨论一致延续到会后。

附：

《东方道藏》的命名与民间未刊道教文献的分类

——《东方道藏》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10月5日，由浙江大学主办、香港儒释道功德同修会协办、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东方道藏》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刚刚召开完“G20”峰会的美丽杭州举行，浙江省民宗委领导、浙江大学领导、国内外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学者以及大陆、香港、台湾、西班牙道教界人士共三百余人参加此次盛会，其中十几位专家学者提交会议论文。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教授作为《东方道藏》这个规模宏大的道书编纂项目的负责人，对《东方道藏》的进展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着《东方道藏》的命名、《东方道藏》的文献分类、《东方道藏》的编纂体例以及《东方道藏》的意义和价值四个主题展开，有十几位专家学者和道教界人士针对这些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旁征博引，各抒己见，为《东方道藏》的出版与后续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东方道藏》的命名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有几位参与《东方道藏》的命名主题讨论的专家学者代表认为，《东方道藏》的命名可以再考虑。一方面，《道藏》是有其特殊含义的。这体现在编修方式和经书内容两个方面。中国历史上，《道藏》是皇帝下诏书、由道教界完成编修的得到官方认定的道书精华汇集，是中国道教界专属性传统的一个传统。《道藏》的知识产权属于明朝皇帝，而后属于人民。《道藏》是编修成集以后成为道教界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了解、保存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内容上看，历代《道藏》涵盖广泛，其分类方法为三洞四辅十二类，涉及各种道教经典。《东方道藏》项目是由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目前收集的民间未刊道教文献主要以手抄科仪本为主，内丹、医药、教理教义等方面的著作不是特别多。另一方面，“东方”这个范围不是很明确。项目收集到的民间未刊道教文献虽然有少量来自湖北、山东、香港、台湾乃至日本、韩国，但大部分来自中

国大陆的东部地区。从中国有 3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角度来说,《东方道藏》项目目前收集的道书可以说是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一部分道书,这样的民间未刊道教文献在中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都存在。因此把部分地区民间道书的汇集称作代表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东方道藏》,是可以再考虑的。有学者提出《东方民间道书合宗》这样的名字可能更加贴切一点,事实上,取名“某某民间道书汇编”这样一类的名称,丝毫不影响这部道书本身的巨大价值。

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松涛研究员对由原先《东部道藏》改为《东方道藏》的缘由作了说明。道教是多点起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地方出现的,因此有必要考察东部地区道教文献情况以推进区域道教史的研究。古代官方编订道书时所的名称其实有很多,《道藏》只是其中的一个。历史上有些地方道书集合也被称之为《道藏》。虽然《道藏》的文献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但其实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块内容:第一,道教神学的构建;第二,道教核心信仰——神仙信仰的核心内容,包括内丹和外丹;第三,道法与方术,主要是符箓和斋醮。再加上道教历史,比如宫观山志,史记方面的一些资料。民间道教的神学可能是比较难找的,这是客观事实。而神仙信仰以及内外丹的内容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至于“东方”二字,是之前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改为东方以扩大影响,这是可以再讨论的。总之将项目中民间未刊道教文献的汇集成为《东方道藏》是可以与历史相吻合或者说是有传承的。

第二,《东方道藏》文献分类将以地域为主,其中科仪的分类可以考虑按功能和仪节划分。考量历史上道教对文献的分类,有很多种分类,且各有千秋。根据《东方道藏》所搜集的文献,大致把它分为道教宗谱、道教志、道坛文献、宫观文献、乩坛文献、档案和其他文献七个大类。这七个大类除了道教宗谱、道教志、档案之外,都按地域进行二级划分,原因是这些文献相对来说较少。二级划分之下,同一道坛、宫观、乩坛的文献又有三级分类。道坛分为祖师家谱、仪式抄本、符箓咒语、内密、传戒授箓、印鉴文书、掐诀踏斗、乐器乐谱、神像画、法器衣冠、法物、道教民俗文物、道坛布置、道教术数、内丹武术与医药以及道教文学艺术等等十五类,初步建立一个分类体系。既然《东方道藏》收集到的民间未刊道教文献主要以手抄科仪本为主,那么就不得不重视科仪的分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把科仪类的经书分为五大部分,即经、箓、科、法、术。《东方道藏》收集的这些材料具有自身的特色,可以尝试着提出按照科仪的功能去分类,更加直观,再在备注中标注这些科仪分别是出现在哪个地区的,有利于比较研究,充分体现各个地方道教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也能兼顾整体性和结构性、时代性与稳定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设想,因为很多文化与宗教现象、很多材料不能马上分清楚所属类别,而任何一种分类都存在它自身的局限性,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另外,有学者提出,可以参考道士们自己的分类、按照仪式的具体做法分类,征求教内人士的意见。应该说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第三,《东方道藏》的编纂体例在参考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应有一定的创新。现当代有很多道书的编纂体例。例如王秋桂编纂道教科仪本汇编的方法,主要分为八种:

第一种是道坛源流，第二种是坛班道士，第三种是道坛科仪，第四种是道坛抄本，第五种是道坛结构，第六种是道坛法器，第七种是道坛法符，第八种是道坛音乐。再比如朱越利先生《道藏分类题解》，按照学科分类共设有拾伍部，分别是第壹部哲学，第贰部法律，第叁部军事，第肆部文化，第伍部体育，第陆部语言文字，第柒部文学，第捌部艺术，第玖部历史，第拾部地理，第拾壹部化学，第拾贰部天文学，第拾叁部医药、卫生，第拾肆部工业技术，第拾伍部综合性图书。《藏外道书》则是将全书内容分为：一、古佚道书类；二、经典类；三、教礼教义类；四、摄养类；五、戒律善书类；六、仪范类；七、传记神仙类；八、宫观地志类；九、文艺类；十、目录类；十一、其他，共十一类。这些编纂体例都值得《东方道藏》借鉴。

从历代道经的编纂来看，其实不必拘泥于书名是否称为《道藏》，主要还是看编纂的内容和质量。现在，如果确定以《东方道藏》为名称，那么体例、范围上一定要明确。首先编纂的内容里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加强文化建设的需要，突出它在民间的活跃性；其次编纂的技术上要重视道教文化的研究和提炼，提炼出道教的核心思想，用最简单的语言提炼表达出来，符合现代实际的需要，发挥道教界的作用。最后，编纂的过程中要重视编纂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巴蜀书社施维编审提出，专业的学术团队和专业的出版团队的结合是《东方道藏》编纂出版的关键，一定要尊重出版规律，尊重市场需求。他建议《东方道藏》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东方道藏》的文献库建设，文献库保存十多年来搜集抢救来的民间道教文献，其功能是全面地收集保存。第二部分，精选适合学术研究的文献编成一部文献书，推广于图书馆、道观，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书，方便查找、翻阅。第三部分，择取适合于普通大众修行的小册子标点、整理，印成平装。尤其是要做出方便查找的索引，可以增添按照笔画分类的题解目录，突出其特色。另一个需要推进的工作就是数据化。将《道藏》的一些资料、关键词，有可能是《佛藏》里也有、《四库》里也有的，进行整理和关联。甚至可以把学者们的研究集中起来，关联学术论文等研究成果，供拷贝使用。如果可以做出符合规范的索引以及数据化成功，那《东方道藏》就是一个活资料，每个人找到马上就可以用，大大提高了使用率。众所周知，道教历史上编纂成册的、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明代的《正统道藏》，第二部是巴蜀书社出版的《藏外道书》，这两部书在研究道教的学者或者道门人士里面，都是使用率很高的。孔令宏教授这部民间道书的编纂出版，有可能是继上两部道书之后，会在学术界、道教界引起影响的第三大编纂的道书工程。

第四，《东方道藏》项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论是官方道教还是民间道教，她承载着先民对生命的追求和关怀，道教与中国人生老病死全部生命过程密切相关。道教文献是道教发展的重要载体，《东方道藏》项目收集明代以来民间未刊道教文献的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历代道书的校勘和研究以及历代书法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对未来道教思想史的重构奠定了厚实的文本资料基础，有助于学术界对儒家、佛教、道教三教在民间实践中互动关系的重新评估、界定，也促进和深化区域文化史、地域民俗学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民间道教史、

民间宗教。官方道教与民间道教，特别是明清以来官方道教在民间的延续以及民间道教与巫术结合的特殊表现形式最近成为学术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民间丰富多样的习本文献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预见《东方道藏》的出版将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研究明清以来的道教历史。也会让人们深度认知道教，逐渐摒弃之前对道教的一些不恰当看法，从而促进当代道教的发展。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当前正逢盛世，在 2015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会议上，明确提出编撰《中华续道藏》的计划，目前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已将此项目列入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特别项目中。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把《中华续道藏》的编撰列为了文化重大工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道教典籍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东方道藏》项目将会促进《中华续道藏》的工作，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良性竞争，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同时会《东方道藏》项目提高浙江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名度和美誉，《东方道藏》的第一辑争取在今年年底交付出版社，尽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把它出版出来，也是对浙江大学建校 120 周年校庆的献礼。

《东方道藏》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香茶斟满，美酒开瓶，海内外嘉宾济济一堂，但这似乎不是痛饮庆功的时刻，《东方道藏》项目任重道远，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可能一代人完成不了，还需要后人继续下去。这离不开政府的亲切关怀，离不开香港儒释道功德同修会、浙江大学等机构组织的大力支持，离不开道教界人士的鼎力相助。相信《东方道藏》项目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省重点研究基地浙大宋学研究中心

主编：陶 然

编辑：张 婧

2016 年 12 月 20 日